

难忘陈毅同志，在华东工作过的以及我国许许多多的人，甚至我这样基层工作人员或普通一兵，都对他倾心敬慕不已。

1949年11月，(前)苏联“以米哈伊洛夫为首的文艺代表团”访问新中国，先到北京，再访上海，这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次迎接外国文艺团体来访演出。

我们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工场布置组奉命到北站布置欢迎场面，中俄文标语有二十多条，白纸剪字，大头针别上红布长幅，细麻绳一拉，自以为这气氛够热烈的了，只是觉得一条红幅，上中文下俄文，字显得小了一点，似乎有些遗憾。

客人将在下午六点钟进站，约四点，陈毅同志来到，抬头把横幅一看，就问站上的同志：“这是哪个搞的？”答说是军管会美术工场搞的。问：“他们有人在这里吗？”说：“有。”“叫他来！”站上同志马上要我去。

我就在附近，问答也听到了，记得当时并不惊讶。陈老总人人都敬重他，却没有哪个觉得他可怕的：我以为是有个字写错了或排列错了，要改。我走近陈毅同志向他敬礼，他问：“你是哪里的啊？”我说是美术工场布置组的。他指指标语横幅问：“这是你搞的？”我说是我们几个人搞的。他脸色很严峻，大声说：“同志！这里是上海！不是闵家庄！（注：闵家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曾在此驻扎，位于今山东省青州市弥河镇东南）——你是闵家庄来的吗？”我说是闵家庄来的，还听过您南下动员报告。他有些厌烦：“又是报告！”

我知道他对这样布置觉得太简单了，就嗫嚅地说：“我们还想——保持解放区艰苦朴素作风……”

“艰苦朴素那是对内！对自己人要永远这样要求。”陈毅同志反驳我说：“现在是上海，欢迎外宾，你这样的东西——”他指指横幅，“马马虎虎的，外国人会认为你看不起他！你知道吗？”他挥挥手说：“这不行！拆掉重来！搞好一点！”说罢他回头走了；又突然转头向我笑笑，说：“你会搞好的。”

我真是满头大汗！陈毅同志批评得完全正确，是我错了，可是现在还有不到两小时，“搞好一点”又没个底，好到什么程度呢？他还信任我会搞好，怎么办？

布置组副组长叶苗，原是在上海搞电影布景的，他问我：你敢不敢负责？我说陈老总指示，多用些钱不会有问题的。叶说不但钱，现在要有一批干得快又干得好的人才行；有二十几位搞电影抢景的，可以保证又快又好弄出来——只是他们来了，你就应该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当时，在新解放的上海城市内，失业的人口很多，介绍人参加工作是最伤脑筋的事情。我想，目前十万火急，就拍胸脯说：“我负责！”那器材呢？叶说，请他们带来，用多少算多少钱就是。

陈毅元帅和普通一兵

吴联膺



1949年7月6日，驻上海市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检阅，举手敬礼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前排右四）、副司令员粟裕（前排右二）

新四军文化战士吴联膺和战友们在解放的淮安城墙上绘制的领袖像 张爱萍将军 摄影 军博画家彭彬 提供

攻城云梯和巨幅画像

吴榕美

写下这个题目，是因为忘不了北京军事博物馆的新四军老画家彭彬叔叔对我说的话：美术宣传工作在战争中作用非常重要！在刚刚解放的淮安城墙上，新四军“苏北美术工场”的画家们在你爸爸的带领下，连夜赶画巨幅领袖像，运河上行船乃至很远的地方都看得见，对后续解放其他城市起到了很大作用，鼓舞百姓，震慑敌伪，有的城市因此就是和平解放的。

家父吴联膺于1992年去世，他生前曾在记录中描述：并非用七架攻城云梯，在三丈六尺高的淮安城墙上弹制九宫格，绘制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气象雄伟，引得众多百姓围观、赞叹。他从上海（1939年上海美专西画专业毕业）带去的一小箱油画颜料早已用得差不多了，只好用点灯的高子油（苏北海滩长的野油料草子）和药房买的蓖麻油

加上颜料店、油漆店里买的各种红、绿、蓝色调出自制的“油画颜料”，只在面部主要部分用上海带去的油画颜料，效果还不错，得到同志们特别是百姓的赞扬。彭彬叔叔说这幅照片就是张爱萍将军用当时苏北解放区缴获的唯一一台照相机拍摄的，那个站在画像下的小人就是我，当时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呢！

因此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军管会美术工场的这批从苏北解放区南下的美术战士，在1949年上海解放的庆祝游行和各行各业的庆祝大会上，绘制大幅领袖像、书写宣传标语等等美术宣传工作成为他们忙碌的主要内容。而家父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这篇纪念陈毅市长的文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宣传文化工作在上海解放和新中国成立的庆典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作者为吴联膺之女，另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皆为吴联膺收藏。）



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



吴联膺随部队南下解放上海时照片

叶苗一个电话，立即有两辆卡车飞来，跳下近三十位熟练抢景工人，和他们简单商量一下，马上分工动手，按三夹板宽度把中俄文字放大，电动钢丝锯雕字，这工作量又多又细，集中十几位师傅干，把带来的木雕宽花边用电动喷枪喷上金漆，标语牌喷上朱红底，把锯好的字喷金漆，排列好钉上，这些用上的三夹板都用电刨抛光过，十多条双面标语挂上，再牵上数十盏聚光灯一打，金字金边闪闪发亮，字有细阴影，是立体的，这也适合(前)苏联人对红金二色的爱好，又请他们拉来十几条金碧辉煌的长旗帜（本来是插刀枪剑戟的），排放在月台另一边，按红橙黄绿青蓝紫一排排插上彩旗，在数十根月台铁柱上扎上小红旗，都牵了聚光灯打亮……一个小时多一点布置完毕，三十多人都累得通身大汗，大家都放了心；我却是一块石头还未落地，不知陈毅同志意见如何，他历来是大小事都要顶真的。

一

天黑了，灯都亮起，六点差一刻，陈毅同志再次来到，他一看，连说：“嗯！搞得不错嘛！好快！”拉了我问：“你是怎么搞的？”看他那喜笑颜开的面容，我也就高兴起来，说：你说的嘛，这是上海，利用上海技术水平、物质力量、速度效率……闵家庄，可没有这样条件……他又追问：“你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我告诉他：有二十几位失业工人，他们是专搞电影布景抢景的，经验丰富，干起来又快又好，他们是机械化部队，电锯电刨电喷枪，这些旗架、彩旗、金边、聚光灯、三夹板都是他们拉来的，一个多小时就搞好了……他说：“不能再让他们失业啊！”我心里又一块石头落了地，心想有您这句话我回去就好说话了。

他问我：“你原来是在上海的？”我一面陪他一条一条看字，一面回答说：我1939年在孤岛上海美专毕业，到浙江去搞了四年救亡工作，后来逃回来在美专当过助教，我是1945年3月底到苏北解放区的，在苏北美术工场工作过，原来胡考、洪藏同志是场长，后来大批人马跟新四军三师下了关东，黄源、阿英同志就叫我当了场长……他又问：“苏北美术工场？那，淮安、淮阴城墙上画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像，是你画的？”我说是我们大家画的……他握住我的手，拍拍我的肩说：“干得不错，谢谢你，谢谢你。”记得当时被他表扬得难为情起来，兴奋得眼睛含了泪。那真正是上下一致，陈老总对下级多么亲切啊。

列车缓缓进站，接着是鼓乐、鲜花、欢呼、握手、拥抱……的热烈欢迎场面。其实认真看标语的客人不多，但彩旗招展，金红标语牌闪亮，的确也增加不少热烈的气氛。当时陈毅同志要是通过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美术工场层层命令下来改，那只能是红条幅钉白字的寒碜局面了。我们优良传统之一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像陈毅同志这样在关键时刻亲临一线的优良作风是多么可贵啊！

二

1950年我已调到二十三军文工团去了，9月下旬从在慈溪的军部来到上海办印制英雄模范手册，被美术工场同志拉住，说你是最会画大像的——一幅毛主席大像，高十米，阔六米，加上边框、底架将有二十米高，画布已绷钉好，放大格子也打好，甚至轮廓也已勾好，就是没人敢动手涂画油画颜料，太大；你来了，只有抓你的差了，一共只有三天，庆祝国庆一周年大会，只挂这一张像，还是在跑马厅，像前的大毛竹脚手架已扎搭好，实在找不到这么高的梯子……当然，还有不少捧场的话。到现场看了下，只好答应了，只要求多来几位帮忙的。

最苦是连下三天小雨，毛竹脚手架又圆又滑，所幸穿的是部队新发的高腰篮球鞋，不太滑，爬上爬下一身泥水，用冰铁桶调色，一打象牙黑，一打黑棕还画不完眼睛；十多米相当于淮安城墙高了，那时用的攻城长竹梯是坡形，安全感多些，这脚手架是垂直的，不能像后来杂技演

员挂上安全带。当时我还没有心脏病，不怕，爬上去一手抱竖竹，一手用大排刷画，颜料桶也像在淮安似的钩挂在横竹上，这安全只靠自己的镇定和经验的。油画？还想到伦勃朗的色彩规律：从最暗画起，最后一点纯白点在鼻尖上，努力在这大画上求层次、求立体、求质感；十二瓶叫一打，三打土黄，一打朱红，十二打锌白涂皮肤亮部，背景色又不能学伦勃朗那样暗……三天下来累得我痔疮出血不止，到底三十多岁了。

第三天下午，陈毅同志和许多领导同志来到，仰头一看，说：“画得不错嘛，只是颧骨太红了些……是部队同志吗？”当时我束皮带，腰后还挂了把手枪（营以上带短枪），听他这样说，我爬下来向他敬礼，他问：“你是哪里的啊？”我说是二十三军文工团的，被他们拉住画——画不好。陈毅同志看了我一下，笑说：“你不是美术工场的吗？你姓吴，淮安画大像，到上海还是你画大像，画油彩，提高了……”令人钦佩的是他一天要见多少人，一天要办多少事，他还记得像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美工战士！记得当时的疲劳、着急、悔恨都一扫而光了。多年来的忆念，想到就要流泪，这样的好领导，好作风，实在是难找啊！

多少年来，我个人经历曲折，主要是依靠忆念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作风，给予我力量。我们要恢复优良传统，真正能像陈老总那样，做到上下一致，能够深入工作的前线，以平等的精神对待普通一兵，真正与人为善，那该有多好啊！

解放“大游行”中的上海美术界队伍 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纪念七七》 庆祝

